

# 十八大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胡振良

**摘要:**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其基本方面有系统发展:一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认识,拓展了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科学内涵;二是提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自信”,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提高到新水平;三是提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理论、新战略,对“发展起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回答,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到新阶段。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基本问题; 文化自信; 治国理政; 新阶段

DOI:10.16012/j.cnki.88375471.2017.01.001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发展有实践基础、系统内容和特殊意义,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系统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 一、历史与理论逻辑统一,提出和回答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科学内涵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上下五千年,从中国 170 年、90 年、60 年和 35 年,即从中华文明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国改革开放史,尤其是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六个时间段,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由来和发展<sup>①</sup>。其核心是历史与现实结合,认识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 胡振良,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北京 100091)。

<sup>①</sup> 《人民日报》2012 年 1 月 5 日第 1 版。

如何产生、怎样发展;党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结合,又怎样经过迂回曲折、艰辛探索,终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初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使全党牢固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以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搞清楚“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根本的政治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需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且需要回答为什么“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有本质论、道路论等诸理论,还要有原因论、必然性原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更突出地提出和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现实性”问题,它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核心),是回答社会主义“首要基本问题”的前提,从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丰富和发展。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探讨“社会主义首要基本问题”的前提<sup>①</sup>。“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sup>②</sup>,是邓小平高屋建瓴,历史、世界和现实地考察中国发展后得出的基本结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而“政治保证论”是邓小平理论及其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

世纪转折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旗帜,确定“方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并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的实践中,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明确方向”,“抓住重点”,从而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时代内涵<sup>③</sup>,从新的高度进一步回答了包括为什么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问题。

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求真务实,创立科学发展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党的十七大、十八大适应新阶段、新特征,做出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决定,把新时期党的理论与实践的成果归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归结为“三位一体”(道路、理论、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在政治和理论上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寻求什么发展的重大问题。

十八大以来,面对新起点、新期待和新的伟大斗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统一,系统提出和回答为什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其特点:一是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道路问题,也是必然性问题)放在政治之首、理论之先,给予独特的地位和高度的重视;二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

是历史与现实统一深刻论证、系统回答了为什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是有针对性地提出、解答广大干部群众相关的深层次思想理论问题，得出了一系列政治判断和理论结论，如“两个三十年”的辩证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其它什么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等等。这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拓展了“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科学内涵，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论的理论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大重要发展。它极大地增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自信”，也进一步发展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理论“自觉”，我们应当充分地认识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学习、把握和理论创新还需要深化，相关的理论完善也有较大的实现空间。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比较是科学的方法，但只有反映现实、解决问题的科学理论才能对问题做出系统的回答。列宁在谈到理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时指出“迈出最勇敢的步伐的是早就成为理论研究对象的那个领域，是主要从理论上，甚至几乎完全从理论上耕耘过的那个领域”<sup>①</sup>。所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需要在基本问题之“必然性原理”上寻求突破、实现创新。

系统考察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我们进一步明确了相关理论创新发展的方向，这就是坚持唯物史观和革命辩证法统一的哲学基础和根本方法；科学把握作为客观基础和现实依据的“世情”和“国情”；始终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推进和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作为回答和解决问题的总的指向。而其关键是：一脉相承，对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发展，对时代的变迁及其世界格局特点进行创新分析；与时俱进，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基本矛盾、发展阶段和相关问题进行科学把握。

首先，从宏观范围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背景和“大”依据。

我们认为，近代几百年，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是“资本占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发展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创造了现代文明；但在现代文明矛盾的基础上产生了社会主义，把世界社会主义提上日程，开启了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

如果说在“战争与革命”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具体、必然地联系起来，从而决定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独立、解放斗争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前途的话，那么在“和平与发展”时代，民族发展、落后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就历史、具体地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尤其使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可能”也“必然”寻求另一条发展和现代化之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793页。

路，从而使社会主义，既是一种人民的可能选择，也是一种客观“必然”的历史决定。

第二，从国内情况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和“总依据”。

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但又经历着崛起的东方大国。从生产力上看，一方面，改革开放使中国与世界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一个地球、同一个世界”，中国与新科技革命“同步”、与新生产力发展“同期”；但另一方面，“一个中国、三个世界”，中国又具有生产、社会和人的社会化、现代化总体水平的落后和发展的极不平衡性。二者的统一构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基础。

从生产关系上看，经过“一化三改”，党领导人民走出社会主义改造的独特道路，在东方大国成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又经过40年改革开放，在新时期初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它制度。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上看，中国首先在发展阶段、发展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而中国一定意义上“是首先用革命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列宁语），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因此，第二，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我们是在相对落后的物质基础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而第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社会的基本矛盾不仅存在、发展，还体现出特殊的内容和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对矛盾之双方有相适应的一面，也有不相适应的一面。“适应”是问题的主要方面（社会主义必然性也在这里），这就决定了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其“不适应”是次要的方面，但也是“客观现实”、“内在特点”、“有时还很突出”，这就决定了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坚持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不动摇之两者的统一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

总之，社会主义在中国，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选择，既是时代的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国国情的客观要求，而多方面结合，最后现实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必然”。我们的结论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就在多种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中，必然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在认识上，我们就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既有世界眼光，又有国情的分析，我们就能够既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坚定的自信和自觉，又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主观能动意识和辩证的“清醒”。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道理，这就是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和自觉奠定坚实基础的理论（原理）和认识。

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必然性”和“现实性”，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工程之一，必须以总书记的讲话为指导，在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不断科学探索、理论发现。

## 二、提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自信”， 丰富发展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sup>①</sup>中系统阐述了“文化自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四个自信”）发展为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四个自信”），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与制度自信”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思想，是我党对文化作用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境界，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新水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新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个新发展。

###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及文化自信的提出

刘云山同志在中央党校201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定文化自信，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彰显了我们党鲜明的文化立场，进一步凸显了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把我们党对文化作用和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一个新的境界”<sup>②</sup>。其中“高度自觉”、“凸显（全局）地位”、“认识新境界”，是讲话的几个关键词，也是需要深刻认识和把握的首要内容。

首先，文化是关于社会生产的价值，文化及其文化自信具有整体性战略地位和意义，总书记系列讲话把文化及其文化自信进一步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

一个社会是一个广泛联系的有机整体，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的统一。本质上，“经济”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政治”是权力（权利）的生产和再生产，“社会”是（狭义）人的生产和再生产，“生态”是环境的生产和再生产，“文化”对于社会的意义是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文化相关的内容和方面很广，但实质是环绕着一个核心，这就是价值，因此，讲文化最重要的是要讲价值，讲文化自信首先和必然讲价值自信。此外，文化有大文化和小文化之分。大文化是指作为社会诸方面基础的东西，是贯穿社会各个方面的，是一个广义的文化概念、文化视野；小文化则指社会的文化领域，如教科文卫诸方面，是狭义的文化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丰富的内容，是二者的统一，因此，必然首先从社会的联系、整体、全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高度去认识广泛的、基础的文化价值，去把握文化自信及其重要意义。

<sup>①</sup> 《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sup>②</sup> 《人民日报》2016年9月2日。

第二，文化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所由产生和发展的价值基础，要从社会主义整体层面认识文化，总书记系列讲话也是把对文化的认识放到社会主义这个位置上了。

社会主义是思潮、运动、制度和价值的统一。世界社会主义500年是价值（文化）基础上思潮、运动和制度的“一体”发展；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兴衰成败100年的重要启示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和制度的统一”；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0年是社会主义价值的“回归”和实现。我们需要从社会主义的高度去认识文化（价值）及文化自信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道路、理论和制度“四个自信”的基础上牢固地树立起文化自信和价值自觉。总书记是反映规律、适应要求把文化和文化自信及其意义放到了社会主义的层面加以认识和把握。

第三，“文化自信”的文化是与道路、理论、制度相对应的概念，总书记系列讲话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识文化和文化自信的内涵及其意义。

以往我们更多是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联系讲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5周年大会讲话是同道路、理论和制度联系讲文化，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其核心是文化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从道路、理论、制度和制度去把握。因此，这里不仅是对文化的新认识，也是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总之，讲话是在新的战略高度，从社会主义层面，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野，尤其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并列提出和阐述文化和文化自信问题的。因此，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系列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识的新境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新发展，其重大意义一定要从这样两个层面统一地加以把握。

## （二）关于作为文化（价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的内涵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内涵，党的文献也多有系统经典的阐述，全党也已形成了统一的认识和广泛共识。那么，什么是新认识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呢？

社会主义文化及价值是关于社会主义意义、作用、效果和重要性的系统化的观点、看法和认同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核心，以历史为基础，以现实为依据，以未来为导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目标，“根本在于有贯穿其中的科学理论指导、坚定理想信念、正确价值追求，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还有“牢牢把握（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

“重要方针并要落实到文化建设各个方面”<sup>①</sup>，是一个包括认知、理想、信念、价值、追求、精神、道德、方向，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人的关系价值和意义的观点体系和认同系统。

1. 以人、社会、劳动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的逻辑起点。把“人”、“社会”和“劳动”作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逻辑起点是有充分根据的，以此为基础建构价值体系既反映了社会主义价值的本质特点，也指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的根本区别和联系。

“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价值理念，坚持“以人为本”而非以神为本，因此，社会主义价值传承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的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

但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主张的以人为本，不是以单“个人”为本（个人主义），而是以集体、社会的人，即以“社会”为本，是社会主义。它强调的不是个人本位，而是社会本位，是主张在尊重个人权益基础之上的社会本位，认为只有在社会而非个人本位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和理想社会。这种主义是在否定资本主义个人本位及其价值的基础上历史和逻辑地产生，又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扬弃和超越。

此外，“劳动”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活的源泉，而不是资本。作为劳动者的多数人而非资本拥有者的少数人是历史和变革的真正创造力量。所以，社会主义主张，以劳动为本，尊重劳动、依靠劳动、发展劳动和为了劳动（劳动者）。

资本主义主张个体主义，由于每个人的社会基础不同，所以其以人为本的主张意味着少数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强者”占据主导，产生剥削，进而出现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而社会主义以劳动为本位，其结果必然是劳动高于资本，是以多数人为本位。所以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是劳动的解放，进而是人的解放。

2. “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终极价值目标。“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未来社会的本质规定”，也必然是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②</sup>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明确说明，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sup>③</sup>。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都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但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一直是社会主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党校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刘云山出席并讲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901/c64094-28684608.html>。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2页。

<sup>③</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

义坚持的基本原理和主旨。因此,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终极价值目标。

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以劳动为本,是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逻辑起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而价值起点和终极目标内在联系、相辅相成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有着突出重要的地位。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理念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完整价值体系。价值与社会的各方面和各主体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价值理念被它们影响和决定,也反过来发挥自己的影响和决定作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有价值基础和终极目标,也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具体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及其相应的具体范畴。二者相辅相成,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本质,决定后者的性质和特点,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和展开,决定着前者的发展与实现。

在现实性上,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才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也必然要转化为引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济价值理念、政治价值理念、文化价值理念和社会价值理念,社会主义价值也由此渗透到国家意识、时代精神、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形成特定的自由、平等、民主、效率、公平、和谐、文明等价值,又成为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各学科的研究对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理念有丰富的社会内容,有包容发展的特点,它指导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也在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sup>①</sup>。

### (三)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

十八大报告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科学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习近平总书记《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讲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构成及其关系做了权威的解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sup>②</sup>中则明确地提出了“文化自信”及其意义,强调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从生成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文化(价值)基础上实践、理论、制度的紧密结合,既在文化(价值)基础上展开实践,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以不断实现文化价值。

<sup>①</sup> 以上内容见本文作者胡振良另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8期。

<sup>②</sup> 《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从关系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是有力的“支撑”，四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sup>①</sup>。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与制度自信”提供有力的“支撑”。具体上我们还可以对文化及其意义进行深入地认识和解读。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面写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的旗帜，是在价值基础上的理论、道路和制度的统一。科学、正确地认识作为价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三、提出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理论、新战略，对“发展起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回答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临治国理政的新形势、新问题、新任务，在领导党和国家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理论与实践结合，深入探讨、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建设规律，对我们要什么样的治理，如何治理做出了系统的回答，提出了治国理政的一系统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形成为治国理政思想的完整的体系，解决了“发展起来后”怎样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在实践上则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 （一）新起点、新阶段、新问题

1993年邓小平曾深刻地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历史确实印证了“总设计师”的这一战略判断。

近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最突出的特点是发展，一方面，是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综合国力加强，另一方面，是新起点，中国发展也有诸多的挑战：如人均GDP还不高，进一步推进全面小康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资源能源限制下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依赖创新作为发展的动力，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国内国外安全风险等等。

“当前转型中国仍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又处于矛盾凸显期和改革攻坚期，所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改革发展的道路上有不少问题。比如中国经济“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步入“新常态”；比如发展之后，国内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关系上的“隐忧”；以及中国迅速

<sup>①</sup>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第10页。

崛起后与美国日本等旧霸主发生冲突,可能与现实的国际环境的“挑战”。这就是所谓中国面临的“三大陷阱”:“中等收入陷阱”<sup>①</sup>、“塔西陀陷阱”<sup>②</sup>、修昔底德陷阱<sup>③</sup>。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是处在历史的新起点,我国逐渐进入“发展起来以后”的历史新阶段,我国的经济社会明显的呈现出新的一些阶段性特征,人民群众有新期待,历史有新要求,事业有新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因此需要不断地创新发展。

## (二) 新理念、新理论、新战略

在领导党和国家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理论与实践结合,深入探讨、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建设规律,对我们要什么样的治理,如何治理做出了系统的回答,提出了治国理政的一系统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形成为治国理政思想的完整的体系并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创更新的局面:

一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化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三个自信,坚定了治国理政的根本方向。十八大以来,新阶段新的境界,一个最为鲜明的特点,是以举旗定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内涵,强化了全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习近平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告诫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面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是确立“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把治国理政方向和目标具象化。他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

<sup>①</sup> 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和1万美元以下为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根据国际经验,在这一起点上存在着发展的两种可能,或者转型成功,或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sup>②</sup> 塔西陀陷阱:古罗马史学家塔西陀认为,当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社会都会给出负面评价。

<sup>③</sup> 修昔底德陷阱: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

三是从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确立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十八大以来，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党在五位一体建设格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而坚定自信、立足实际、针对难题、廓清了治国理政全貌，抓住了治国理政的关键，拎起了中国发展的总纲，确定了工作的方向、重点。

四是在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过程中提出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实现发展理念的新飞跃（破解治国理政主题的创新理念）。鉴于形势变化，经济发展进入变速、转型新常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系统论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强调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指出“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攸关“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式和发展着力点。

五是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治国理政的重要部分和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保持外交大政方针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主动谋划，努力进取，对外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也形成了全球治理相关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其中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进世界治理更加公平、合理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三）新结合、新发展、新局面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承前启后，形成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方向的坚定自信、对问题的深刻洞察、对大势的准确把握，丰富了中国经验、拓展了中国道路，有特殊的历史地位，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全新社会，是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开始以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的重要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问题，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宏大系统，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sup>①</sup>。

<sup>①</sup> 《人民日报》2014年4月17日。

情况发生了新变化，现实有机遇和考验，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重要主题。“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是十八大以来我党一系列理论创造和实践创新的核心和统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全球和国家治理系统的观点体系。“两个治理”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国家治理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什么、怎么样推进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现代化，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要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等基本问题，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时代性、人民性和世界性，开辟了我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治国理政”重要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的最新成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是统一全党的共同的思想基础，是指导当前全党工作的行动指南。

(责任编辑: 崔桂田)